



忆昔倾谈鬓尚青 ——怀念袁阔成先生

□王充闾

初次相遇，心系大“大辽河”

惊悉著名评书演员袁阔成先生仙逝，心中怅惘久之。痛惜我国文艺界摧折一位大师级巨擘，也为自己失去一位相知相重的老朋友感到无限哀伤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一个偶然机会使我幸得和袁阔成先生相识。当时，他在营口市曲艺团，我供职于营口日报社，同在一个城市。可是，由于他整天深入生产第一线 and 部队基层演出，难得见上一面。这年初秋，我陪同新华社记者前往盘山县一个生产队采访省特等劳动模范、饲养员刘恩田，恰逢他来这里慰问演出，这样，才得机会作了一次深谈。

因为晚上有演出任务，午餐过后，大队便安排袁先生休息。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，得知我属于盘山本地的“土特产”，两年前又曾在这一带下放劳动过，便拉上我谈有关大辽河的轶闻趣事。其时我们都还年轻，他虽然大我6岁，也不过30岁出头，精力十分旺盛，一袭浅黄色中山装，腰杆笔直，面庞方正，双目炯炯有神，透出一股勃勃的英气。

我说，所谓大辽河，指的是辽河千里来龙，在这里接纳了浑河、太子河之后的下游一段。这里有过舳舻相接、客商云集的笙歌岁月，但更多的是烽烟弥漫、炮火连天的“乱八地”，是英日俄等列强的角斗场。有如冀中平原，以此为背景可以写出一部《红旗谱》那样的小说。许是出于职业上的敏感吧，听到这里，他立刻眼睛一亮，拍着床板说：“你讲，你讲！”

我说，远的不讲，从甲午海战和日俄战争开始，此地历尽了人间苦难，兵连祸结，民不聊生。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日寇入侵，这里的抗日义勇军，青纱帐起，昼伏夜出，使日本关东军和伪军心惊胆丧。老帅、少帅，张氏父子的故事也在这一带流传。解放后，由于生产力得到解放，加上河淤黑土地，土沃水肥，人说“插上一根锄杠，也能够长出庄稼来”。但是，每逢雨涝，河水漫溢，顿成水乡泽国。在战胜水灾、发展生产过程中，涌现出许多事迹感人的先进人物。当天要慰问的刘恩田就是其中之一。讲述中，我穿插了一些故事：诸如，为减轻辽河水患，清末举人刘春煊首倡开凿双台河，同营口的英国商会进行顽强斗争；日伪时期，绿林好汉项青山斗勇斗智，枪毙汉奸凌印清；1958年，为发展水稻生产，引进入双（台）河，“三千壮士斩辽河”——作为这场惊天动地的壮举的直接参与者，我们在水寒刺骨的早春，三天三夜不眠不休，同呼啸奔腾的河水搏斗。待到堤坝胜利合龙了，我一爬上堤岸，便喊“渴！渴！”待到乡亲把碗送过来，我却已经就地倒下，呼呼大睡了。

袁先生听得很投入，直到大队书记推门进来，他才缓过神来，说以后找机会继续唠。

“咱们庄户院，一切简办”

也算是一种缘分吧，这个机会果真来到了。1965年8月底，报社接到市委通知，抽调我到营口市大石桥镇东窑村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（通称“四清”），时间从9月到次年3月，中间跨越春节。听说，这里是市委书记陈一光同志的联系点。

入村之后，我惊喜地发现，袁阔成先生也在我们这个工作组。原来，陈书记不仅特别关心袁阔成的政治进步——两个月前，他光荣地成了一位共产党员，而且，对于他的评书艺术极为欣赏，经常鼓励他多说新书，说好新书，为全市文艺队伍树立一个榜样。在工作组全体成员见面会上，组长老李介绍过袁先生之后，又向我交代：在开展“四清”工作中，接受实际锻炼，提高思想政治觉悟（此前，我曾几次提出入党申

请）；同时，帮助袁阔成收集、整理一些农村素材，充实、丰富其评书艺术资源。说，这是陈书记的意见。

尽管我也从事文学创作，但离曲艺专业很远，怎么竟被“钦点”，分派这样一项任务呢？会后，袁先生告诉我，那次慰问农业劳模演出之后，又带队去了矿山、海防，陈书记专门听取了她的汇报。他谈了下一步说新书的打算：要投身农业第一线，进一步深入群众，体验生活；同时，抓紧阅读一些新出版的优秀长篇；响应市委号召，发掘本地（例如大辽河）资源，讲好身边故事。这时，他就提到了我们那次交谈，说要找我帮助，提供了一些素材、线索与思路。啊！原来如此。

工作组下分六个组，我们这组五个人，袁阔成和我同睡一铺炕，同吃农家“派饭”，一同下地干活。本组承包的是蔬菜小队，妇女、老年劳力居多，有道是：“前面走着老黄忠，后面一群穆桂英。”由于男人多在镁矿、铁路务工，不像其他小队兼营副业，或者烧窑、开矿，因而清理账目、核查经济问题的任务较轻。我们除了参加生产劳动，就是串门入户，访贫问苦，向社员了解村里情况。当时，纪律十分严明，突出强调工作队必须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，绝对不许搞特殊化。当时农家饭菜，都是大白菜、小豆腐、高粱米粥；稍微有点差异的，是经领导特批，农家大嫂专门给袁阔成随锅烙上一块玉米面饼，为的是增加一点热量，饭后好给大家说两段评书。怎么称呼呢？社员们习惯叫他“老阔”，不知是谁最先叫出来的。他是市曲艺团团长，“四清”规定一律不叫官衔，而且叫“团长”也觉得隔着一层；叫“老袁”吧，他刚过而立之年，并不老；直呼其名，又显得不太尊重。而“老阔”这个称呼，亲切、得体、老少咸宜，应该说是很妙的。

入村的第三天，午饭轮到了一户铁路工人家庭，房间较为宽敞。摆下了饭碗，收拾过炕桌，就发现窗前、门外挤满了人，有的老头、妇女还上了炕。地面留出空场来，供“老阔”摆架式。房东大嫂依据看到的说书场景，事先摆上一个小桌，后面放上一把椅子，倒了一杯茶水，还找出一把折扇，只待说书人“咔嚓”一声打开扇子，便会开讲。可是，“老阔”却全是另一套架式，他亲自动手，把桌椅连同茶杯、扇子挪开，随口说道：“咱们庄户院，一切简办。”其实，即便是在城市剧场，他早已革除了这一套。听说，他在演艺界创造了三个“第一”：第一个让评书走出小茶馆，进入社会大舞台；第一个脱掉传统的长袍大褂，换上中山装；第一个撤掉场桌、折扇、醒木，改坐着说为空手站着说。

这天说的是《肖飞买药》。看过《烈火金刚》的朋友都知道，故事改编自书中第21、22两回：“五一”反扫荡，隐蔽在小李庄的一批八路军伤病员，急需消毒、疗伤药品，可是，要买药就得进城，日本鬼子监守着城中据点，怎么办？上级经过审慎研究，决定派遣县大队侦察员肖飞前往执行任务。一路上，他先后制伏了特务队长何志武和几个小特务，最后又智斗日本宪兵头子川岛一郎，巧夺脚踏车、摩托车，顺利地闯关越卡，终于把我军急需的药品弄到手中。通过“老阔”的精彩表演，肖飞这一勇敢机智的八路军侦察员英雄形象活灵活现。

尔后的六七月，得超过上百次吧，“老阔”都像这样，在午饭后或晚上，随地打场，即兴演出；有时还到瘫痪、孤寡老人家里去献艺。演出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新书，而《肖飞买药》《江姐上船》《许云峰赴宴》《舌战小炉匠》等最受欢迎，可说是百听不厌。一位见过世面的退休老工人说，故事还在其次，就是爱看“老阔”扮演的英雄形象，一身正气，大义凛然。那天，“老阔”刚刚说完《江姐上船》，老奶奶就合掌念佛，说：江

姐、许云峰、杨子荣、肖飞是救苦救难的“四大菩萨”现身的。还有一次，我和“老阔”一道，扛着锄头进菜园子铲菜，发现小记工员正在那里模仿他，说肖飞把烟头摔在狗特务的脸上，“滋啦”一下就烫出一个泡来，狗特务一哆嗦，烟头又顺着脖梗子往下滑，滚到胸脯上，疼得直打激灵。小记工员又学着“老阔”的腔调，问道：“没想到吧，何志武？”对方唔拉了一句，心想：“我想这干啥？碰上你肖飞，这不倒霉吗？”一举手，一投足，作派、声调，活脱脱一个小袁阔成，逗得大家笑个前仰后合。

在人物个性上下足功夫

“古有柳敬亭，今有袁阔成”之誉，在我国评书界传播已久。关于柳敬亭，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在其本传中记载，当日柳敬亭拜莫后光为师，师傅告诉他，说书应能勾画出故事中人物的性格情态。于是，敬亭退而凝神定气，简练揣摩，经过一个月的刻苦磨炼，前来拜见。师傅说：“你写的书，能够使人欢娱喜悦，大笑不止了”；又过了一个月，师傅听过，说：“你写的书，能够令人感慨悲叹，痛哭流涕了”；再回去，又苦练了一个月，师傅赞叹：



袁阔成(中)、王充闾(右)在农村

“这回行了，已经达到还没有开口，哀乐之情就先表现出来，使听众不能自己的精妙程度”。这里讲了评书表演的三个层次、三重境界。

如何能够攫攫人心，使人喜，使人悲，使人听了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？其间，固然需要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，但历史存在，向来都是依人不依事，人是一切出发点与落脚点，工夫应该下在人物的塑造上，也就是莫后光所说的，“应能勾画出故事中人物的性格情态”。

我曾反复地琢磨过，村里民众对于袁阔成的一些评书段子，之所以听了还想听，要说是缘于故事情节，那早已谙熟于心了，而且，有的也并非特别曲折、复杂。那么，吸引力究竟何在呢？结合我的切身体验，觉得核心在于他刻画的英雄人物智勇双全，充满了人格魅力。记得金圣叹说过，《水浒传》“只是看不厌，无非为他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了出来”，“一样人，便还他一样说法”，所谓“各有派头，各有光景，各有家数，各有身份”。

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，袁阔成不仅表演上出神入化，同时还是出色的作者。可以说，每个精彩的书段中，都饱含着他的深邃的思考和独到的匠心。他善于借鉴，吸收长篇小说的成功经验，一改受中国戏曲影响的传统评书主要是交代故事情节的做法，高度重视细节刻画和心理描写，既细致入微，又合情入理。《许云峰赴宴》中，为了刻画这位英雄人物沉着镇定、处变不惊的气质和心态，评书中摹写了正在精心思谋应敌之策的他眼中所见：“休息室布置得很别致，地下铺着地毯，周围摆着几张

沙发，对面有一架老鹰牌的大座钟，一人多高，钟舵‘嘎噔嘎噔’地来回摆动，东西两侧有二米见方的两个水晶鱼缸，里边是清冷冷的水、绿莹莹的草，百十条热带鱼，在里面游来荡去……他坐在一只沙发上，若无其事地抬起左腿搭在右腿上面，伸出双手，扯平了长衫的衣襟儿，轻轻地往膝盖上一搭，双手自然地放在胸前，两只眼睛悠闲自得地看着缸里的游鱼。”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，是写肖飞登上川岛一郎的跨斗摩托车，“头闹拱，二闹拽，三闹没有四闹快”；咕嘟嘟，离开药房，冲出东门，再一次经过日军岗哨时，鬼子一瞧肖飞来了，心想：你看怎么样，我就知道是自己人嘛，有急事，把自行车扔在家里，骑摩托来了。肖飞到了眼前，鬼子大喊一声：“乔子开！”（日语，意为立正）肖飞一听，什么？饺子给？燕窝席也没工夫吃了。二者一静一动，一庄一谐，张弛有致。前者写的是激烈交锋的前奏，“万木无声待雨来”，使听众产生悬念与期待；后者属于闲笔，信手拈来，触处生春，令人忍俊不禁。

一次，我和“老阔”坐着大板车往镁矿职工食堂送菜。路上，我们聊起小说写作有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之别，如果是第一人称，当你不在场时，叙述视角就

会受到限制。他说，评书的好处，就是全知视角，但在内容方面，有交代故事情节的叙述和描摹故事中人的言行、心理的表述之分。我问：这一叙一表，哪个更难？他说，相对地看，表述的要求更高、更全面。难在人物的声口话语、作派行为与心理活动，都必须充分体现个性化。我说，你说的评书段子，人物林林总总，八路军将士、知识分子、扛大活的、摆小摊的、大特务、狗腿子、恶霸地主、管账先生……即便同属革命队伍，团政委、大队长，小战士，也是“人之不同，其异如面”。到了你的嘴里，个个特征鲜明，绝不雷同。为了体现个性化，你在表演中像相声大师侯宝林那样，描情拟态，绘声绘色，惟妙惟肖，不仅模仿人的各种动作，令人拍案叫绝；就连开车，哪怕是一个挂挡的微小动作也不放过，一听就能分辨出是大型客车、载重货车还是小轿车，简直是“绝了”。

袁先生说的人物、事件，高度形似中又略带夸张，但能掌握分寸。既真实可信，又突显特点，画龙点睛。对于古代经典小说，学习、借鉴中，他有所扬弃、取舍。比如，《水浒》《三国》中都有过度夸张、渲染以至脱离常态的情况，像鲁智深倒拔垂杨柳、武松空拳打虎、周瑜因气致死，等等，袁先生都尽量加以避免。

就时间而言，我只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叶跟他有过一段接触，而对他中老年时段的大量代表性作品涉猎不多；就书目讲，这一阶段他主要是说新书，加上限于当时条件，说的多为小段（当然大都是被称为“极品”的小段），这样，我所亲炙的大部头传统书目就很少了。

谦卑自抑 处处从严

1948年，袁阔成刚满19岁，在山东关茶社说《雍正剑侠图》。正赶上解放大军入关，他也参加演出接待。当时，军管会一位负责人在同他谈话中，肯定了他的热情、才干，鼓励他再上层楼，并建议他读些新时代的小说，尝试着说新书。这样，他就说起了赵树理的《小二黑结婚》，“开创了评书说现实题材的先河。”1950年3月，评书《小二黑结婚》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，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，《灵泉洞》《吕梁英雄传》《新儿女英雄传》《红旗谱》《烈火金刚》《敌后武工队》《创业史》《艳阳天》等几十部，相继播出。

1958年他在营口市曲艺团，以《舌战小炉匠》荣获全国曲艺优秀奖。演出归来，他便走出市区，深入工矿、农村、部队。一天，他在海防前线慰问守岛战士，行走在崎岖不平的石路上，看到小战士吃力地背着表演用的桌椅，汗流浹背，很是心疼；当他走进会场，面对战士们一双双渴望与期待的眼睛，恨不能把自己的全部评书家当合盘托出。可是，眼前却被一台木桌隔离开了，而且，还要安然坐下。于是，毅然决定，撤掉桌椅，自己要站在战士中间，面对面地表演。这样，一下子就消除了同战士的距离，从而取得了从艺以来最佳的演出效果。也正是从此开始，他断然革新了评书几百年传承下来的以坐相示人、高台教化的半身艺术，转而为手眼身法步全部亮开的全身艺术。

除了袁先生高超的演艺，我觉得最值得看重，或者说最能反映先生本质特征的，还是他的高风亮节，艺品艺德。这里，说的是撤掉场面桌的过程，而我心领神会的却是一位青年艺术家与工农兵心贴心的动人心曲，在我们相处的二百多天中，可以说，每天我都感受到他对农民父老兄弟的灼灼爱意、脉脉深情，以及一种天然的亲和力。他宛如鼓足了前进动力的风帆，浑身注满了政治热情与生命活力，决心要倾尽一己之所长，为人民大众说书献艺。由于从心里喜欢，庄户院的诸姑伯叔常常不依不饶，说完一段，还得再说，有的还喊起口号：“好不好？”“好！”“再来一个，要不要？”“要！”立刻腾起响震屋瓦的掌声。这时候，他感到最为开心。他特别看重听众的反应，经常和我讨论，如何抓住听众，特别是抓住年轻人的耳朵，让他们听得进、受感染。而对自己，则谦卑自抑，处处从严要求。其时，他在评书界的首席地位已经确立，可说是誉满神州，但他从不以权威自居。当听到有人赞颂时，他总是那句话：“不要瞎吹乱捧啊！吹捧不好。”

他是“艺以化人”、“寓教于乐”的忠实维护者，十分反感“听书只图个热闹，只是乐呵乐呵”的说法。我曾听他愤激地指斥（这种情况很少见）：“图个热闹——怎么可以这么讲呢？我们不能忘了艺术的价值。”他一贯主张评书是严肃的艺术，提倡高雅，反对粗俗。他尤其重视艺风、艺德，强调“人有人格，艺有艺格”。我注意到，他每次登场，都很重视仪容。即便是在地里干活，休息时应社员请求临时打场，自然来不及及梳妆，但也总要从衣袋里掏出小梳子，拢一拢头发，迅速进入“端乎其形，肃乎其容”的状态。这里反映出，他对于祖国的传统艺术、人民的文艺事业，秉持一种敬畏的心理。

这种内化于心的追求、志趣，支配着、激励着他刻苦钻研、奋力学习。诚然，他的卓越成就的取得，确同“袁氏三杰”的家学渊源、祖传技艺有直接关系，但根本之点还在于他自身的努力。在农村这段时间，他的体力、精力都处在最佳状态，除了像一般工作队员那样干活、开会、同干部社员谈心，还要拿出很多时间表演，付出几倍于他人的汗水与心血，但他从不抱怨，而且多次谈到直接同农民交朋友的收获；当然，个别时候也说过，读书完全放弃了。过后，在几次会面中，他都谈到开卷受益、读书有得的体会。一次，他说，京戏《打渔杀家》是一出“水游戏”，萧恩就是阮小五嘛！不过我说《水浒传》里可没有记载。他说，类似情况不少，比如《黄鹤楼》和《单刀赴会》，内容大体相同，都是“三国戏”。二者都取材于元人杂剧，但是，罗贯中只选用了后者，所以，《黄鹤楼》不见于《三国演义》。

说到他的学习借鉴，精钻细研，记得有篇文章里讲，他擅长往传统书段里加事添彩。比如，曹操杀孔融，是由御史大夫郗虑（他和孔融有仇口）告密引起的，这在《三国演义》第40回里有记载，但很简单——郗虑所告发的秘事，无非

是孔融背后发泄不满，说曹公坏话，并且和祢衡有交情。过去，袁先生也是这么照着说的，但总觉得没能击中要害；于是，就考虑往里加些内容。加什么呢？加了郗虑对曹操说：“您还记得您在破袁绍的时候，公子曹丕收了袁绍的儿子袁熙的夫人甄氏，孔融曾经给您写过一封信，信上说到了武王伐纣把纣王的宠妃妲己赐给了自己的弟弟周公旦吗？”可别看轻这句话，其中可暗藏机锋。孔融的真实用意，是说，武王把妲己赐给了周公，其实是他自己看上了妲己。但是，由于妲己毁掉了纣王江山，被目为“不祥之物”，如果武王自己纳了妲己，传出去影响不好，所以，便在名义上把妲己赐给了周公，其实是暗地里留给自己。因为只要把妲己收进自己家里，那人家家里什么事，外人就问不得了。一言以蔽之，孔融是在您破了袁绍，把甄氏赐给了公子曹丕，其实是您自己把甄氏纳了。这可就扎到曹操心窝上了，坚定其除孔的决心。而这种加事添彩，又并非随意而为，大都有根有据。孔融写信一事，见于《后汉书》本传。只是那里并没说是郗虑讲的；袁先生根据情节发展需要，把它放到郗虑身上了。

和“老阔”一起“越狱”

不知不觉间，6个多月就过去了。工作组总结座谈中，我说，最大的收获是接受实际教育，获得政治思想上的进步。1965年12月18日，我在这里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。期间，听遍了袁先生说的《红岩》《烈火金刚》《林海雪原》《暴风骤雨》《赤胆忠心》《敌后武工队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等新书中的著名段子，既饱足了精神滋养、艺术享受，更充分接受了革命传统教育，也从他那高尚的情操、品格、艺德中，认知了一位艺术家所应遵循的正确道路。这对于一个志在献身文学的青年，是至为珍贵的偏得。如果说有遗憾，就是“帮助袁阔成收集、整理一些农村素材，充实、丰富其艺术资源”这项使命落空了。主要是我缺乏应有的主动性；而他也实在太紧张、忙碌了，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说段子，很难找到倾谈机会。其实，即便时间允许，要给一位艺术臻于至境的名家以“帮助”，又谈何容易！当时我曾表示，回去后想法加以弥补，比如，认真写几篇报道，大力彰扬袁阔成同群众打成一片，充满政治热情，说新书，讲艺德，以及刻苦钻研、精益求精的事迹。没有料到的是，回到市里，我就调离了新闻单位，进入市委机关；不久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。而批判“三家村”，新闻单位首当其冲。结果，我又被揪回原单位接受批判。这样，那些报道的构思与设想便付之东流了。

与袁阔成再次见面，是在3个月之后。那天午前九点钟，机关造反派通知我，返回原“四清”单位接受社员批判。上了东窑大队前来接人的拖拉机，一看，“老阔”竟在上面，还有工作组组长老李，和进驻其他小队的两名队员。人并不齐，许是临时没有找到吧？我冲着“老阔”叫唤一笑，抱拳问道：“袁兄，别来无恙乎？”他眨了眨眼睛，“哼”了一下，再不作声。这时，我才注意到，副驾驶座上挤着一男一女。

到了大队部，拖拉机就“突、突、突”地开走了。村里喧闹得很厉害，大喇叭震天响，像是两派在辩论，鏖战方酣。这对年轻男女，像是小学教员。把他们安置在一间闲屋里，他们说去向造反司令交差。屋里没有桌凳，只有几袋水泥和一堆木屑。我们五人站在那里，也不知“司令”何许人也，只好静静地等待着。已经过午了，也不见人来，门却上了锁。我说：“坐以待毙吧。”“老阔”便问：“往哪坐啊？”逗得大家轰然腾笑起来。就这样，又静等了几个小时。眼看天色已晚，肚子饿得“咕咕”直叫。不知是谁说了一句：“咱们干脆跑吧。”原来，后墙上有个方形窗口，上面塞着几片草袋。用手一拉，全部落下。这样，“越狱”行动就开始了。把几袋水泥搬过来垫脚，五人陆续钻出。为了不致被人发现，我们避开大路，穿过收割后的农田，绕到火车站。待到返回市区，已经万家灯火了。

过后，将近3年时间，我在第二纺织厂参加劳动，“老阔”进了市宣传队歌舞连，见面机会不多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一次集会时意外邂逅，当即合影留念，并在当晚作了一次长谈，得偿多年愿望。不久，我便调入省城，而他也进京了。虽然天各一方，晤谈机缘不再，但其潇洒音容，豪迈气度，特别是卓越、超拔的评书艺术，总能从广播、电视里不断地接收到，使我感到十分亲切与欣慰。



袁阔成(中)、王充闾(右)在农村

袁阔成(中)、王充闾(右)在农村